

很难想象，一个临海而居的古村，历来外出谋生者多、从事商贸者多，却依然尊师重教，于是读书人甚至出国留学者也多。因此，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拔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“三多村”。

20世纪以来，这个村走出了大量的读书人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，走出了1000余名大学生，更有40多人留学和旅居海外。说起这些荣光，拔南父老称，这是村里历来重视和支持教育的善果。



光绪《澄迈县志》中的『博滴浦』为历史上拔南村的所在地。

滨海古村拔南村：尊师重教勤助学

文/图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今年秋季，拔南教育基金会对村里考上研究生的3人、本科的14人、专科的10人和重点中学的8位学子，发放了总共121000元的奖学金。这样的奖学、助学活动，拔南村已经坚持了15年。

而回望从前，拔南村对教育事业的重视，始于立村之时，迄今已有700余年。

宋末元初 教谕落籍

历史上的拔南村归澄迈管辖。

宋代末年，有来自广东潮州的郭姓和郑姓渔民进入琼州海峡打鱼，被澄迈北排湾富庶的天然渔场所吸引，于是在一个小半岛住了下来。此后，又有大量广东和福建渔民迁来，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小渔村。这个小半岛当年的名称已经无法查考，不过光绪《澄迈县志》的舆图中，对那里的标识是“博滴浦”，而“拔南村”一名，也始见于清代的方志。

对本岛方言和地名研究多年的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剑三，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称，“博滴”也好，“拔南”也罢，在当地的临高语中，发音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“博”“拔”发音为bak，是“口”的意思，琼北地名中常见的“卜”“北”也是这样的发音和含义；“滴”和“南”的发音也都是nam，意为“水”。临高语多倒装现象，因此，拔南村名的实际意义是“水口”，与它过去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。如今，一条在当地村民口中被称作“青山”的小河，蜿蜒绕村，流入“海仔”（内海），拔南村西北片，便是“水口”——入海口的位

随着人口增加，淡水资源紧张，且有海盗不时劫掠，村民们便不断迁往海湾南部，更接近当时的澄迈县城（今老城），但仍靠海吃海，北排湾之内，茂盛的红树林之下，各类海产品

都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。改变拔南先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，或许是后来落籍该村的一位宋季文官。据《澄迈县志》和拔南《童氏族谱》记载，童姓先祖童应魁（字文魁）原籍福建莆田，曾任琼山教谕，宋朝灭亡后，携妻带儿来到拔南隐居，教子育孙的同时，也开设私塾教

授渔家子弟。

今人推断拔南村的历史，正是依据童应魁入村的大致时间，再稍稍往前推，约700多年。

默默走过了元代将近百年的历史，拔南读书人从明初开始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。

先是洪武年间，童应魁的六世孙童贤愈考取了岁贡，出仕安徽安庆府推官，负责一府案件的现场勘察和刑事判决；紧接着，童应魁的七世孙、童贤愈的侄子童真，与琼山士子唐绢同时考中了天顺壬午科（1462年）举人，赴任广西平乐府推官。

叔侄二人都当推官，掌管刑名职权，不知是历史的巧合，还是有此家族基因？可惜县志和家谱中都没有更多的记载。

有明一代，拔南村还走出了不少廪生和监生，不再一一列举。

兄弟父子祖孙 接踵登科

拔南村的第二位举人是郑稽，成化癸卯科（1483年）乡试中举，且是“亚魁”，即第六名（举人的第一名为“解元”，第二名是“亚元”，第三、四、五名称“经魁”），被授予广西雒容知县。由于他是在琼山县学读书后中举的，因此一直被误以为是琼山人。郑稽与兄长郑樾自幼失去双亲，相依为命，年长后也不分家，一切财物均由兄长掌握安排。后来郑樾早逝，留下寡母和两位孤女，郑稽善待嫂子，并抚养其二女成人，将她们嫁给读书人家。郑稽的事迹在当时被传为美谈，因此《广东通志》和《琼州府志》都为其立传。

天启甲子科（1624年），拔南人钟玠中举。除了举人，拔南村的贡生数不胜数，在一众贡生当中，不少人也有亲缘关系。如王名臣（明末）和王擢（清初岁贡，未赴廷试便病故）是父子，康熙岁贡郑兆昌和乾隆拔贡郑绳祖则是曾祖曾孙关系。

郑绳祖自幼聪明，学问过人，乾隆六年（1741年）成为拔贡后，八度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，于是回乡教书为业，培养了大量优秀学子，一时名声在外。1722年至1728年在任的县令鹿耿、1749年至1754年任上的知县

党维世，都先后聘请他到景行书院执教，县志称“游其门者，成材最多”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拔南村的第四位举人是清代康熙壬午科（1702年）林焕，族老都说那是因为林家与童家比邻而居，沾染了书香世家的教泽。后来，林焕的弟弟林炳也成为一名“拔贡”，林梦雉则在雍正年间成为“岁贡”，出任广东开建县训导。

在清代，拔南林氏读书人可谓出类拔萃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和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林世楠和林有塘父子又先后考取当年的“岁贡”，其中林世楠上任福建长乐县训导，一时间又传为佳话。

据了解，拔南村现有人口6000余人，共有24个姓氏。明清两代，村里还有王昭、陈善、李姓的李明良和李一槐、吴氏的吴鼎和吴鼎、曾家的曾秀士和曾毓晖等人也都是贡生。光绪年间，曾毓晖还参与了《澄迈县志》的纂修。

二十世纪迄今 办学助学成风

如果说科举年代的荣耀已成过去，那么，100余年来的拔南村，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人事。

拔南村八旬老人曾繁茂、曾令唯告诉记者，20世纪初，拔南学子邝秉文、王日民、曾祥鸾就考上了上海的大学；1919年，曾祥鹤到法国勤工俭学，先后获得硕士、博士学位，返国报效祖国，当过教授、银行行长；曾祥鹤的弟弟曾祥铎留学日本，抗战时期参加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；吴乾章留学英国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著名晶体学家……

1930年，村民蔡家棠出资，并利用村里的祠堂和庙宇，创建了“拔南小学”并亲任校长，从海口、府城等地聘请名师，且采用新制教学，甚至打破旧有观念招收了14名女生就读。

1939年，日军侵琼后，拔南小学老师蔡国桀还创作了海南话抗日歌谣：“菜头脯，番薯粥；吃饱饱，气力足；打日本，救中国。”鼓舞了吴燕依等几位学子投笔从戎，上前线抗日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拔南村、丰仍墟、文章村、儒宗村共同将日伪时期的警察部队所在地改建为“澄迈县老城第二中小学”，短短几年就培养几十位学子考上私立琼海中学（今海南中学），临近乡村荣山、马村、花场等十几个村的学子，慕名前来就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拔南重视教育之风一如既往，使得蔡森（中山大学）等数十位学子靠助学金完成大学、中学和技校的学业；1977年恢复高考，当年就有王才壮、吴光恒、吴建永和吴进远等人考上名牌大学；改革开放以来，拔南教育如春风化雨，村中才俊更如雨后春笋，先后走出吴子云（清华大学）、吴子恒（清华大学）、吴明（中山医学院）、邝雄（中国人民大学）、韦长传（北京大学）等1000多名大学生。

近年来，拔南更是奖学、助学成风。2004年初，村里成立了“拔南教育基金会”，以奖励考上大学、重点中学的学子，短短两个月就募捐到56万元。5月29日挂牌成立当天，旅居美国的曾祥鹤子女曾令国姐弟、吴光恒兄弟、新加坡李花南姐弟，在德国读书的曾秀华和在广州的乡亲都发来贺电。

基金会的创始人、旅居新加坡的企业家李传业，小时候因家境贫寒没钱读书，却历来对教育格外重视，膝下儿女全都留学国外，自己也乐于捐资助学、奖学。

据拔南基金会秘书长钟鸾善介绍，15年来，先后有1632人次为基金会捐款2597900元，已颁发奖学金和帮扶学生支出1676000元，惠及765名大学生、19名硕士生、3名博士生，以及一批重点中学和小学前三名



旅居新加坡的企业家李传业捐建的拔南村大门。